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与传导路径

——以赣南传统村落为例

吕添贵^{1,2}, 杨 蕾¹, 汪 立¹, 李洪义¹

(1. 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江西财经大学 生态文明研究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赣南传统村落农地流转风险与传导路径, 以期为推进下乡资本与农地流转的有效融合提供参考。结合访谈调研和问卷调查识别传统资本下乡过程中的农地流转风险的形成机理、传导路径和防范体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资本下乡推动农地流转同时存在经营风险、财产风险和社会风险; (2)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传导路径受到经营市场的不确定与监管机制的不到位、社会保障不到位、准入机制不完善、流转期限不合理和管理体制缺失的公共影响; (3) 规范完善农地流转程序、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和提高主体性行为风险防范意识是为降低资本介入农地流转风险的重要方式。研究结论显示基于资本下乡视角探究了赣南传统村落农地流转异化风险形成机理与传导路径, 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资本下乡; 农地流转; 风险识别; 传导路径; 赣州市东田村

中图分类号: K902; F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210-(2019)05-078-11

The Risk and Function Path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and Cultivated Land: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LV Tian-gui^{1,2}, YANG Lei¹, WANG Li¹, LI Hong-yi¹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paper to explore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evention of

收稿日期: 2019-07-31; **改回日期:** 2019-10-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64016 & 41561049);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7YJC630100);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7M622098);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71BAA218017); 江西省博士后项目(2017KY55); 江西省博士后日常资助项目(2017RC036);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GL18242); 江西教育厅科技项目(GJJ160460)和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16GL31)

作者简介: 吕添贵(1986—), 男, 讲师, 博士后, 从事耕地保护与土地规划研究。E-mail: lvtiangui@163.com

通信作者: 杨 蕾(1997—), 女, 从事土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E-mail: 565929780@qq.com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Gannan Soviet Area.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operational risks, property risks and social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to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2) the uncertainty of the operation market and the inadequate supervision mechanism, the in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the imperfect access mechanism, the unreasonable transfer period and the lack of management system lead to Dongtian Village. The bad behavior of farmland transfer forms the function path of farmland transfer risk; (3) Standardizing and perfecting the farmland transfer procedure,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cultivating individual risk prevention consciousness are the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to prevent the farmland transfer risk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t concluded tha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unction path of farmland alienation risk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xi Soviet Area,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orderly farmland transfer and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farmland transfer; risk identification; preventive measures; Ganzhou Dong Tian Village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不断推进,城市工商资本加速向农村流动,深刻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1-2]。尤其是2013年国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后,全国各地兴起了培育“工商资本”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浪潮,农地经营主体逐渐由传统自耕户、种植大户拓展为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公司等,资本下乡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同时也促进了农村土地要素合理配置^[3]。一方面,工商资本下乡解决了农地规模经营资金短缺、投融资渠道单一和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的困境,建立了多元化、低成本和广覆盖的投融资机制^[4-5];另一方面,工商资本在推进农地流转的同时真正用于农业经营活动的并不多,资本并未投资于农业,但却圈占大量农地,抑或是工商资本不熟悉农业全产业链的经营特点,导致资本下乡存在的各类型的风险^[6-7]。因此,在逐利性的工商资本与脆弱性的农业生产结合背景下,如何剖析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风险路径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学术界围绕资本下乡过程的农地风险进行了大量探索。然而,当前研究对于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之间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有研究指出,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农地流转的结合,解决了当前农地流转中资金不足等情况,可实现土地流转和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也带来困惑,囿于工商资本的逐利性与短期性,容易出现从“资本下乡”演化“风险下乡”,甚至“恶意囤地”、“毁约弃耕”、农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等。为此,从农户生计角度发现资本与农地流转夹杂着农村社会的权力相互纠结,使得农户生计受损。与此同时,从产权角度则发现,大规模农地流转中工商企业与村社组织之间“资本—权利”结盟,村社组织在农地产权冲突博弈中占据独特优势,形成农地自演化产权与强制性演化产权的激烈冲突,衍生为耕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耕地利用风险等,这些都成为

资本下乡带动农地流转的障碍因素,甚至成为扭曲异化风险。在资本下乡耕地风险管控方面,为降低工商资本对农地流转所带来的风险,合理引入明晰的耕地产权契约制度、农户生计保障体系以及耕地可持续利用风险等^[8-16]。综上,已有研究围绕资本下乡对耕地流转的风险利弊、风险识别与风险防范的探讨,为有序推进工商资本进入农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参考。然而,随着工商资本不断介入农地流转,工商资本对农地流转现实诉求尚不能满足理论分析和显示引导,尤其是以传统村落的工商资本参与农地流转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研究选取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风险—路径—防范的逻辑框架,分析资本下乡对农地流转风险的传导路径,以期扭转当前“资本下乡”向“风险下乡”转变的理论价值判断,为合理引导传统村落的农地流转和保障农户合法权益、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参考。

一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一) 研究区域

东田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村内分为东田坑组、坞石坑组、坳高组、上村组、排高组、后栋组和井头组 7 个村小组,人口约 1 500 人。区域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冷暖变化显著,降水变率大,属中亚热带丘陵山区季风湿润气候区,全村耕地约 46.67hm²,适合农地耕种。东田村位于赣县东郊,东临黄龙村、南面茅店村,西连储潭乡,北接石荒乡,紧邻 323 国道线,村委会位于排高组,老村委会紧挨赣县东高速出口,京九铁路、昌赣高铁和厦蓉高速均从村域内经过,是茅店镇东面的交通枢纽。一方面,受益于便利的交通,东田村外出人口达到 600 人,占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外出农户具有强烈的农地流转意愿;另一方面,赣州市作为传统革命老区,是国务院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区域的原因之一,而东田村作为赣南苏区传统村落,受益于赣南苏区精准扶贫,带来大批参与农地流转的下乡资本,农地大规模流转到新型农业主体进行种植,种植葡萄,西瓜,小青南瓜和竹荪等经济作物。然而,在资本下乡促进了耕地规模经营同时,也存在耕地闲置、农户生计保障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等异化风险。为此,本研究将东田村作为传统赣南苏区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剖析资本下乡背景下农地流转风险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情况

1. 资本下乡案例

课题组 2018 年 7 月前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茅店镇东田村进行调研,对传统村落的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情况和农户对农地流转风险认知展开实地调研。赣县东田村具有良好耕作环境和优质农地资源,同时也是赣州市重要的贫困村。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东田村围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为实现各类农业产业农地规划,村集体进行了大规模农地流转,已形成了农地流转案例,总面积约为 13.33 hm²,占东田村耕地总面积的 29%(表 1),重点形成了以“成氏文化、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生态河堤观光带,建设风情蔬菜观光体验园、芋禾飘香园、百蔬园和七彩花田园等。

表 1 东田村资本介入农地流转案例

序号	面积/ hm ²	流转方式	土地利用方式(流转前)	土地利用方式(流转后)	流转对象(流转前)	流转对象(流转后)	流转时间	流转期限
1	4.67	出租	种植水稻	未定	本村村民	农业公司	2017	20 年
2	2.00	出租	种植水稻	经济作物	本村村民	农业公司	2017	20 年
3	2.67	出租	种植水稻	薰衣草	本村村民	农业公司	2017	20 年
4	2.67	出租	种植水稻	竹荪	本村村民	本村农民	2017	10 年

农地流转主要通过村委组织将耕地集中到村集体以后,再流转给农业公司,或者是由农户转包给本村农户(图 1)。在作物种植方面,主要以薰衣草、竹荪等经济作物为主。根据现场调研发现,各类资本进入农地流转,大量流转农地仍处于闲置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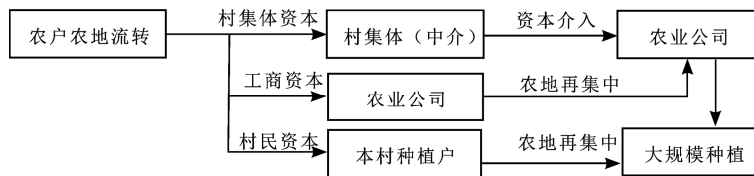


图 1 资本介入农地流转路径示意

2. 农地流转情况

为了解农户对资本介入耕地流转情况的认知水平,课题组以资本下乡与耕地流转农户风险感知为主题,在核对耕地流转情况基础上,对研究区内耕地已流转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共发放问卷 45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 份,占问卷总数的 88.88%(表 2)。其中,农地流转对象中,75.00%的农户将农地流转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农业公司,有 12.5%农户则进行村内村民之间进行流转;另外有 12.50%农户直接将农地流转给农业公司;在非农非粮层面,

表 2 东田村农地流转风险认知情况

类别	频数	所占比例	类别	频数	所占比例			
村小组	坳高组	6	15.00%	流转方式	抵押	13	32.50%	
	上村组	10	25.00%		转让	22	55.00%	
	坞石坑组	6	15.00%		其他	5	12.50%	
	非农非粮风险	井头组	6	15.00%	是否撂荒	存在	25	62.50%
		排高组	7	14.00%		不存在	15	37.50%
		后栋组	5	12.50%	对流转价格满意	满意	33	82.50%
存在	32	80.00%	不满意	7		17.50%		
流转对象	不存在	8	20.00%	是否外出务工	是	26	65.00%	
	农业企业	5	12.50%		否	14	35.00%	
	村集体	30	75.00%	购买粮食支出占比	<10%	19	47.50%	
本村村民	5	12.50%	10%-30%		8	20.00%		
流转期限	0-10 年	10	25.00%		30%-50%	10	25.00%	
	10-20 年	14	35.00%		不购买	3	7.50%	
	20-30 年	16	40.00%					

88%受访者认为存在非农非粮风险;已流转农地利用情况,有 62.50%的农地存在撂荒风险。在流转价格满意度方面,82.50%的农户对农地流转价格较为满意;在购买粮食支出占比中,92.50%的农户都需要购买粮食。

二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

为识别研究区域工商资本介入农地流转风险,从农地流转的不同利益出发,对农地流入方、农地流出方和监管者等参与主体,分析发现农地流入方具有经营风险,农地流出方为财产风险,而监管者则为社会风险(图 2)。

(一)农地流入方的农地经营风险

对于研究区内的资本下乡参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农地流入方而言,存在投资经营风险。一是价格风险。赣县东田村在引导工商资本介入薰衣草和竹荪等农产品经济交易时,农产品的信息不完全对称给资本下乡企业带来利润亏损;二是竞争风险。东田村始终存在农地承包商之间争夺农业种植市场占有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农产品盈利率的抗衡状态;三是投资经营外在风险。主要体现为自然条件风险,尤其是赣县东田村地势北高南低,2018 年上半年暴雨引发洪涝,东田村的井头组、后栋组等因地势低洼,连片已被承包的农田因为积水损失严重,存在不可抗力的自然条件风险。

(二)农地流出方农地财产风险

对于东田村农地流转中被动接受工商资本的农户,则主要表现为财产风险。一是分配失衡风险。据调研访谈得知,进入东田村的工商资本在运营中压低农地流转价格,一般农田是 $12\,000\text{元}\cdot\text{hm}^{-2}\cdot\text{a}^{-1}$,农地流转合同缺乏价格弹性增长机制,引发收益分配失衡风险;二是失业风险。东田村的规模经营者长期占有土地,35%的未外出打工的纯农户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和途径面临失业境况,失业风险致使农户生活水平下降;三是养老保障风险。农地流转可让流转地后的东田村农民获得一定的即时收益,但农民后续仍会面临因为缺少经济来源而产生的养老保障问题。四是面临着产权风险。一方面体现为强制流转风险。赣县东田村为平整土地后统一流转农地,不顾少部分农户的反对意愿,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强制将下村小组、后栋小组等部分核心村小组的农地流转收归村集体。由表 2 可知,东田村流转对象 7 成以上是村集体。村集体在土地平整后承包给农业种植大户,易引发农户的土地产权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土地过度利用风险。流转农户担心工商资本进入东田村后,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不顾耕地地力过度开发利用土地,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硬化以及地力衰退。

(三)监管者农地流转社会风险

政府部门推动资本下乡作用于农地流转,并承担监管角色,同样存在多重社会风险。一是农地非粮化风险^[17]。由表 1 可知,东田村农地规模经营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国家扶贫政策引领下参与农业经营,改变原有种植水稻的土地利用方向,改种植薰衣草、竹荪等经济作物、特色

农产品加工,导致大片农地非粮化,东田村 80%农地存在非农非粮化风险;二是耕地撂荒风险。东田村农地规模经营者为从政府获取更多的政策补贴,热衷于扩大规模而大量囤地,导致中心村大片搭建好大棚的土地大规模撂荒,4.67 hm²良田闲置半年以上,引起了东田村村民的担忧,而在调查的农田区域中 62.5%的农田存在撂荒情况;三是粮食安全风险。由于东田村资本下乡所带来的非粮化和耕地闲置等,浪费村内大面积优质耕地,加剧当下粮食存量的安全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东田村后栋小组、井头村民小组的“被流转农地”村民自食粮食要去市场购买而非自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产需求;四是公信力丧失风险。一方面赣县东田村工商资本化流转导致部分小组农地过分集中,导致东田村组内发展分化;另一方面,出现东田村农地资本化流转中出现干预过度后的农地纠纷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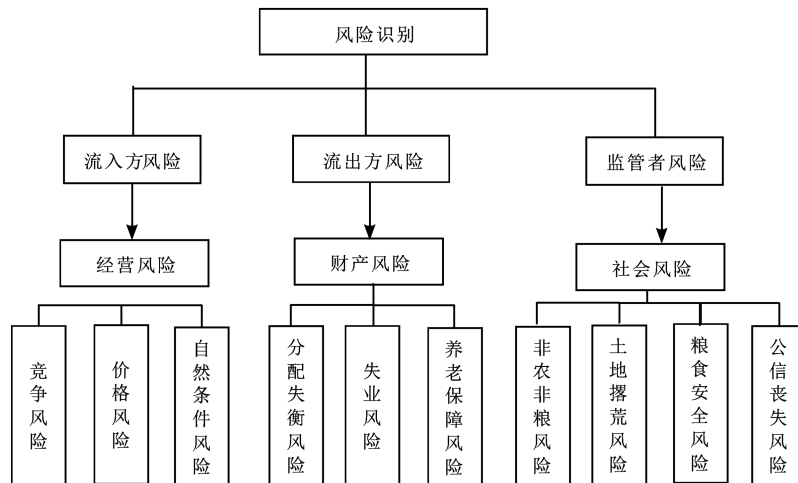


图 2 资本下乡过程中识别东田村农地流转风险因素

三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形成机理与传导路径

作为传统苏区村落的东田村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一种因素直接导致的后果,而是在不确定性作用下,农地流转给承包方经济利益、农户土地权益所带来不利影响,形成了风险源、受体和控制机制等^[12]。其中,风险源为农地流转产生危害的源头,是东田村农地流转风险事件发生的触发条件;风险受体是风险承担者利益受到损害的承受方;控制机制是风险源及传播路径的控制、维护与管理运行模式(图 3)。在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风险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形成了风险源触发风险、控制机制控制风险和风险受体损害的逻辑框架,三者共同决定了农地流转风险状态^[6,18-19]。为此,本研究在分析农地流转风险基础上,尝试从风险系统的角度揭示东田村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与传导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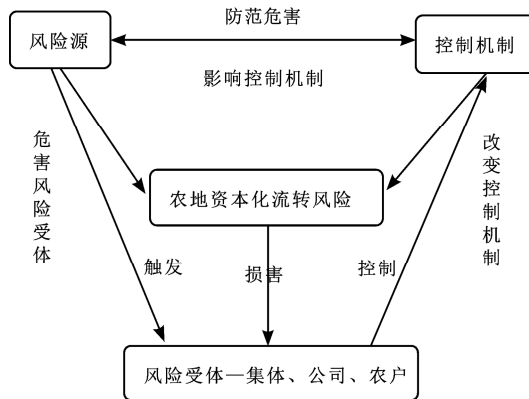


图 3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的风险形成机理

(一) 农地流转风险受体

东田村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受体分为农地流入方(村集体、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公司)、农地流出方(东田村村民)和政府(赣县和茅店镇政府)。资本下乡带来不确定性风险源作用下,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市场竞争波动都会对东田村规模经营者、东田村农户和东田村村委会产生影响,当影响程度超出了任意一方的承担能力,就会引发一系列风险事件。其中,东田村村委会、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公司作为农地流入方和村集体村民作为农地流出方,是农地流转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土地权益和经济利益将受到风险的直接冲击,最终导致东田村总产值下降、农地闲置或抛荒以及农户生计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推动资本下乡引领农地流转的政府部门,因风险事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可能会损害政府形象等。

(二) 农地流转风险源

参与农地资本化的风险受体为农户、规模化经营者和政府部门,三者最终目标都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方面,东田村委会出于精准扶贫政绩和传统村落经济利益考虑,希望通过流转土地获取土地租金,增加经济收入,进而干预农户农地流转。另一方面,农业种植公司则希望以较低的租金流入土地,实行规模经营,获取更高的利润,只有当转入土地的纯收益大于或等于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成本时,才愿意承包土地。因此,农地流转本质上是农业参与主体围绕农地产权进行的持续性定价博弈,博弈结果导致土地流转过程中隐藏着各种风险,最终会使流转利益相关方遭受损失^[20]。

1. 农地流入方风险源分析

农地流入风险源主要受到农业市场与流转预期的影响。一是经营市场不确定风险。调研发现进入东田村的农业公司在实现耕地规模化经营后,使得自然灾害风险损失的范围更加集中,受灾后造成经济损失;其次,农地资本化流转行为产生影响的市場风险主要来自农地资本化流转市场和农地经营市场。二是流转期限不合理。由于东田村农地流转中承包户前期设大棚投入大量资金,签约农地流转合同时流转期限长达 30 年。而村内农地未流转的农户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考虑,不愿与其余规模经营者签订长期合同,宁愿选择短期多次流转。

另一方面,农地流转期限短和流转租金的不稳定,不仅提高了生产成本,还使农地流入方长期投资达不到最优状态,使其不愿在购置农业机械和改善土肥条件等长期投入。

2. 农地流出方风险源分析

农户流出方风险源与耕地质量及其社会保障功能密切相关。一是耕地质量受损风险。东田村农地流转存在经营不善而抛荒或闲置耕地,农民出租的土地因为闲置而杂草丛生和破坏其耕地功能;二是农户生计社会保障风险。赣县东田村规模化农地经营导致耕地运动式集中,使得部分纯农户失去了生活来源。一方面,由于部分流转主体因年龄太大、体力不支和技能缺乏而丧失非农就业机会,在农地流转后将会彻底失业,粮食和蔬菜等都日常支出都到茅店镇集市购买,每年仅靠千元左右的租金收入显然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一方面,东田村外出劳动力多维流动农民工群体,从事的基本都是体力劳动,存在收入不稳定因素。

3. 监管者风险源分析

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其风险源不仅受到管理体制影响,还与监管机制密切相关。一是管理体制缺失风险。为吸引资本下乡从事利润相对薄弱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政策承诺对达到一定经营规模的农业企业提供大量政策补贴,导致大量工商资本倾向于在东田村囤地,甚至出现耕地撂荒和圈地不种的情况。因而,当国家引导政策与现实需求存在缺口时,容易导致政策执行偏差,存在体制风险。二是监管机制不到位风险。本质上,工商资本具有逐利性,势必不断投资能带来更高经济效益的区域,并减少对粮食作物的投入,农地流转后种植将从事“非粮”甚至“非农”经济,这将改变土地原有用途,引发农业生产的“非粮化”风险,而政府监管部门未及时制止,容易产生粮食存量的安全问题。

(三) 农地流转风险传导路径

作为传统村落东田村,在中央苏区振兴战略背景下获得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势必增加了东田村的农村农地资源价值与经济机会,也为农地流转风险路径奠定基础。

(1)城乡边界松动。在城乡融合规划推动下,城乡边界出现松动,城市资本不断流向农村地区,农地作为最重要的资产,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然而,资本介入农地流转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农地流转市场尚未构建,尤其是监管体系还不到位,滋生了资本与权力的不正当合谋;另一方面,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相对滞后,资本进入农地流转的准入机制还不到位,农地流转期限尚未明确,以及农地流转管理体系都尚未形成,这些不确定因素最终为东田村的农地流入方、农地流出方以及监管者提供了不良行为空间。

(2)多重资本介入。在资本追逐利润驱使下,使得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争相涌入农地耕地流转市场,以期通过各类型资本介入,获得农地流转利润。

(3)多重风险形成。由于农地流入方、农地流出方和监管者之间,存在农地介入资本与权力合谋的可能,尤其是在城乡边界松动情况下,村集体、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公司多方利益博

弃下,形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为不良行为空间奠定基础,最终使得资本下乡形成了农地流转的经营风险、财产风险和社会风险的传导路径(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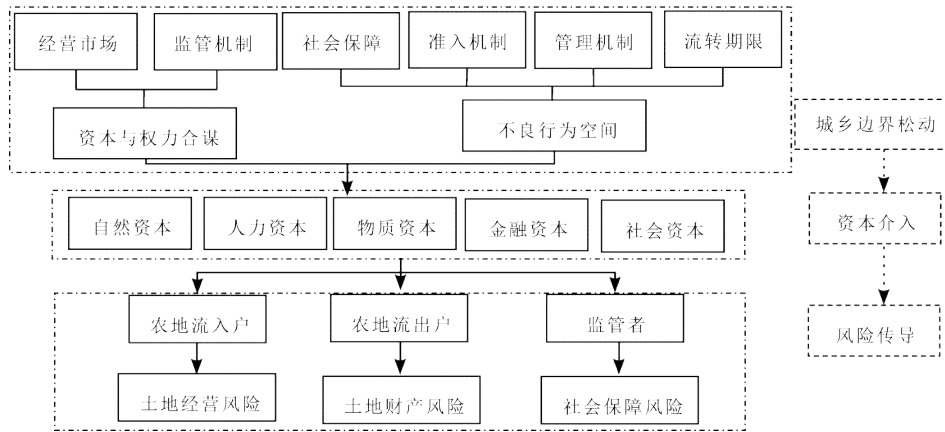


图 4 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风险的传导路径

四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防范对策

对东田村而言,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治理不能针对单一风险事件本身,不仅取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个维度^[21],为降低资本介入农地流转风险,还应从改变风险事件发生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主体行为等方面入手。

(一) 制定完善农地流转规范,明晰制度规则

对于传统村落东田村在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风险的有效治理,有赖于明晰农地流转制度规则,使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之间有明确的预期^[22]。一是明晰农地产权结构,确定土地产权边界,以立法的形式明晰三权边界和权能,保障农地流转农户参与资本下乡的经济收益;二是建立规则约束各利益主体行为,明确农之间地流入方、农地流出方和监管者之间的边界;三是制定农地流转规则的风险综合管理方法,形成流转耕地健康评价与污染修复的可持续解决方案^[23-24]。此外,东田村委会为核心的监管者,需要引导各农地流转参与经济主体,明晰农地流转交易的权利规则,规范签订合同合同流程和履约条件,消除资本下乡中农地流转的租值耗散,进而降低农地流转风险的根源^[25-27]。

(二) 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保障交易公平

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是提高农地流转效率和实现资本市场化运作的重要路径。首先,选择东田村所处的赣县茅店镇建立农地流转中介机构,通过搭建村庄之间农地流转信息平台,提供农地流转法律政策宣传和推送区域农地流转信息,并评估相似地块对农地流转价格和提供参考底价,给予合同签订指导和调处土地纠纷等;其次,设立第三方农地流转风险保障基金。农地流入方在流入农地之前,应根据流入土地规模的多少和双方协定的结果,缴纳数额不

等的风险保障金,以支付流转农户的农地租金和未来农地复耕资金。

(三)提高行为主体风险防范意识,降低风险系数

东田村农户和规模经营者作为最直接的行为主体,还应从行为主体风险意识方面加以防范^[28-30]。一方面,东田村村委会作为中介平台,应为村民以及有承包意愿的种植户定期开展规避农地流转风险、规范农地流转交易的知识讲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农地流转的监管者,还应该引导农户积极学习农地流转的政策法规,避免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尤其是应该通过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的方式,提前规避和防范流转风险^[31];此外,通过合理规避不确定风险。东田村规模经营者还应提高农业规模经营能力,购买农业保险产品等提高风险意识。

五 结 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规划实施背景下,资本下乡是推进农地流转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难以回避的现实助力。本研究以赣南苏区传统村落的赣县区东田村为对象,基于资本下乡视角剖析资本渗透下农地流转风险,分析了农地流转风险的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地资本化的风险防范对策,并得到以下结论:(1)工商资本逐利性与农业生产的脆弱性相结合,农地流入方(村集体、新型职业农民和农业公司)、农地流出方(东田村村民)和监管者(地方政府)(存在经营风险、财产风险和社会风险);(2)资本下乡过程中,城乡边界松动导致资本与权力合谋形成不良空间行为,以及资本逐利性,形成“城乡边界松动—资本介入—风险形成”传导路径;(3)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的治理离不开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共同参与,还与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主体行为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农地流转风险不仅村在农地流转的前期阶段,还贯穿于耕地整理设计、建设和营运等全生命周期过程。针对各类型资本下乡背景下,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到农业规模经营的各个环节剖析相应的风险路径与规避对策,扭转“风险下乡”向“资本下乡”转变的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刘魏,张应良,李国珍,等.工商资本下乡、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效率[J].农业技术经济,2018,(9):4-19.
- [2]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16.
- [3]刘丹,巩前文,杨文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变及优化路径[J/OL].中国农村经济,2018,(12):37-51.
- [4]曾红萍.地方政府行为与农地集中流转——兼论资本下乡的后果[J].北京社会科学,2015,(3):22-29.
- [5]柴鹏.资本下乡、土地规模流转与企业家精神培育——鲁西南Y村个案[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1,26(3):66-68.
- [6]李云新,王晓璇.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J].中州学刊,2015,(10):43-48.
- [7]陈振,郭杰,欧名豪,等.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境,2018,27(5):988-995.

- [8]胡博文.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地流转及利用的影响分析——基于南京市锁石村的调研实证[J]. 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206-208.
- [9]苏玉娥.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地流转风险分析与防范[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1):31-36.
- [10]刘俊. 防范“资本下乡”造成“非粮化”[J]. 中国粮食经济,2013,(5):24-25.
- [11]朱强,李民. 论农地资本化流转中的风险与防范[J]. 管理世界,2012,(7):170-171.
- [12]陈振,郭杰,欧名豪.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 526 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129-137.
- [13]冯小. 资本下乡的策略选择与资源动用——基于湖北省 S 镇土地流转的个案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1):36-42.
- [14]周敏,雷国平,李菁. 资本下乡、产权演化与农地流转冲突[J]. 中国土地科学,2015,29(8):55-62.
- [15]贺雪峰. 工商资本下乡的隐患分析[J]. 中国乡村发现,2014,(3):125-131.
- [16]杜峰. 影响山区耕地流转因素及对策分析——以重庆市江津区 438 个农户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8):89-96.
- [17]谭荣,曲福田.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J]. 管理世界,2006,(12):50-59.
- [18]曲常胜,毕军,葛怡,等. 基于风险系统理论的区域环境风险优化管理[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9,32(11):167-170.
- [19]林旭. 论农地流转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机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8):206-210.
- [20]杨嫒,陈涛. 生产要素整合视角下资本下乡的路径转变——基于山东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J]. 中州学刊,2015,(2):50-55.
- [21]段贞锋.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流转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J]. 理论导刊,2017,(1):88-92.
- [22]温亚霖. 资本下乡的驱动机理及其影响文献综述[J]. 农业科学研究,2018,39(3):64-68.
- [23]赵立娟,康晓虹,史俊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8):158-162.
- [24]曹俊杰. 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J]. 中州学刊,2018,(4):38-43.
- [25]杨雪锋. 资本下乡:为农增利还是与农争利? ——基于浙江嵊州 S 村调查[J]. 公共行政评论,2017,10(2):67-84.
- [26]侯江华. 资本下乡:农民的视角——基于全国 214 个村 3203 位农户的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87.
- [27]蒋永甫,应优优. 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5,(2):143-149.
- [28]顾传辉,陈桂珠. 浅议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J]. 新疆环境保护,2001,(4):38-41.
- [29]王桂华,付新月.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实证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2):155-163.
- [30]张良.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 中国农村观察,2016,(3):16-26.
- [31]周飞舟,王绍琛.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1):66-83.